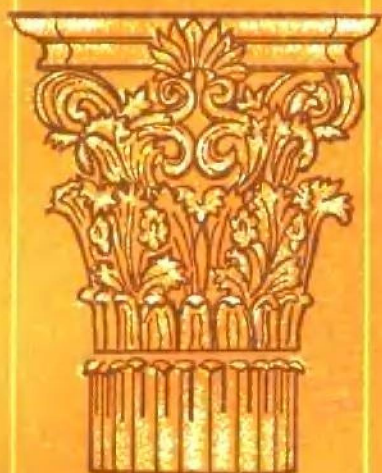


朱庭光 主编

外国历史名人传

补 遗 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重 庆 出 版 社

朱庭光主编

外国历史名人传

补 遗 本

本册主编 曹特金 秦晓鹰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外国历史名人传(补遗本)

朱庭光主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5.75 插页, 4 字数392千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850

书号111:4.70 定价: 2.24元

内部发行

编者说明

《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组稿编辑过程中，有同志曾建议扩大选题范围。由于种种考虑和组稿方面的实际困难，我们决定在现代部分上、下册发稿之后，另编一册先在国内发行的补遗本。现在总算可以发稿了。这一册共辑入66位历史人物的简要传略，大致有下述几种情形。

(一)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有些已故的著名人物曾经有过某种权威性的定评，经过历史的检验已被证明不符合历史实际或者失之偏颇，需要重新评价。对这些人物，国外学术界作了深入研究，提出真知灼见者固然大有人在，但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者，也不乏其人。他们或者故意渲染，借题发挥；或者极力贬抑；或者保持缄默。我国学术界近几年来开始对其中一些人物进行了某些探讨，总还不免有所顾忌，有的还失之粗浅。我们认为，无论对这些人物如何评价，至少应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经历和主要观点，才不致于盲目因袭明明有错的说法。这将有利于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为此，我们愿在这方面作点初步的尝试。

(二) 自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以后相继去世的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人物，其中大多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毕生奋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史学界很少提及他们，当然也谈不上对他们的生平和事业进行认真的研究。这种现象应该尽早改变。当我们汇编各国名

人传略之时，理应有他们各自的一席之地。

（三）与我国有着友好关系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已故领导人，由于这些国家政局变化和当政者的更替，我国报刊文章一般亦不再提到他们。但作为历史上有过影响的人物，仍有必要让人们有所了解。这一类稿件中，包括个别久已退出政治舞台、现尚健在的人物。

（四）新近补充组稿的现代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的传略，其中在思想文化领域有过贡献或较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本来还可以多组一些稿件，只是约请作者很不容易。这反映了已往我国世界史工作者视野过于狭窄的弱点。现在收入的几篇，都不是从史学界组来的。有的出诸名家手笔，有的得到了知名学者的指教匡正。也许这是又一次推动我们迈开多学科协作的步伐，可惜迄今还是步履蹒跚。

（五）有一些是反面人物，由于避免这一类人在现代部分上、下册中所占比重过大，发稿前抽出的。这些人，有的甚至根本够不上被称作名人，而是因其卖国罪行被当作国际关系史上同类人物的通用名词，或者因其在我国恶名昭著但生平鲜为人知，由此勉强辑入，聊备参阅。

编这一册补遗本，颇费周折。一方面是客观的因素，有关的研究者少，能够作为依据的材料很少。本册所收传略许多属于当代名人，从现实政治角度对其研究分析、报道记述者倒有不少同志正在进行；但对我国世界史工作者来说，却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多年来无人问津。这种状况，并非三年五载所能根本改变，因而增加了组稿的困难。

以材料而论，其实也不算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人物，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东方的所谓不同政见者，发表过大量论著，简直是连篇累牍，汗牛充栋。这些论著需要具体分析，其中所述某些事实不能一概否定，但他们的立场、观点、

方法与我们截然不同，记载事实的可信性无从验证，这就不能被认为是我们可以引用或据以立论的资料；至多只能说提供了某些值得注意的研究线索。然而，有关国家正式公布的材料，则往往缺少背景和细节，不足以供研究者用来说明事实。

正因为这些缘故，各篇传略的内容及其深度势必参差不齐。一部分稿件可以认为是概要地描述了人物的生平、事业、思想演变、政治主张及其著述和影响，作出了或者介绍了相应的评价，另一部分稿件只是尽可能如实地记述他们重要的言论和主张，他们所作的重大抉择和从事的社会实践，并不论其是非功过，留待读者自己判断。从提供资料便于查阅的作用来说，这样做也许未可厚非，相信读者会谅解作者和编者研究不够，评价不易的难处。但是，有一部分稿件，连这样的要求也还没有能够达到。我们只好以聊胜于无的心情，向读者提供其人一份较为详细的履历，同时表示歉意了。

另一方面，也有一个面对某些传统习惯的束缚，需要克服某些思想障碍的问题。在过去“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只要是文章和著述中涉及外国历史上的人和事，往往撇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党和国家现行外交政策来鉴别其是非得失，以当前两国关系的好坏作为区别宽严的尺度和取舍的标准。我们常常是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把历史等同于现实，学术等同于政治，个人见解等同于官方言论。仿佛每一篇文章都象是在代表党和政府发表声明，每一件历史记载都能够以现实政治状况如何而转移，每一个学术观点必需同特定时刻具有权威性的政治判断完全吻合。其结果，不是随意斧削，裁剪历史，就是唯恐影响对外关系而予以否决。这也不好说，那也不便说，只好不说。这样，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总是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局限于比较狭小的范围，无法真正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和新的研究领域。应该说，过去世界史工作者不大愿意研究现代史中的新问题，怕担风险，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看来，我们应该坚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严格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只是在涉及现实政治问题时，需要注意不致违背党和国家现行的外交政策。历史研究领域，一般说来，属于学术范畴，应该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不同见解的论争。我们对本册的编辑工作，就是本着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如前所述，书中载有传略的一些人物，严格说来，还缺乏真正深入的研究，因而没有、也不可能予以准确的评价；即使对某些人物有所褒贬，无论正确与否，都是作者或编者的个人观点，都是不成熟的，有待逐步完善的。

当然，我们力求本书质量更好一些，事实无误，取材适当，内容充实，观点正确。为了避免可以避免的差错，先在一定范围内发行，俟听取读者、世界史工作者和有关各方面的批评建议之后，再视情况作必要的补充修改。

本册由曹特金、秦晓鹰、于沛主编，世界历史所有几位研究亚、非、拉史的同志帮助作了一些编辑工作。书中插图由聂文华绘制，封面设计姜梁。目录按姓氏笔划为序编排。

在我们组稿看稿过程中，得到不少同志的支持、鼓励和帮助，甚为感激。这里不再一一列名。谨向阅改过稿件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期待着对本书内容不妥和不足之处提出批评，也希望得到如何改进的建议。

朱庭光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目 录

马林	殷叙彝 (1)
马歇尔	王宏昌 (7)
马林科夫	徐翔 徐小雄 (14)
马萨里克	李寒梅 (21)
瓦尔加	吕忆环 (28)
瓦尔拉	古 月 (33)
贝利亚	苏 涵 (38)
丹吉	陈峰若 (43)
乌布利希	施 向 (50)
布托	张序江 魏渭康 (57)
布克	吴 军 (63)
布哈林	叶书宗 (71)
兰格	王宏昌 (80)
卢卡契	张春风 冯植生 (88)
头山满	赵金钰 (99)
达乌德	彭树智 (104)
本·贝拉	潘蓓英 (113)
乔巴山	卢纪雨 (120)
吉拉斯	周尚文 (126)
吉田茂	熊达云 (133)
吉斯林	张毅君 (142)
毕加索	倪培铭 (148)

多列士	陈 沂 (154)
卡塞姆	唐宝才 (163)
卡冈诺维奇	江智武 (169)
皮达可夫	张海滨 (175)
托洛茨基	周尚文 (183)
约翰·里德	胡国成 (195)
纳吉	候风菁 伊加 (205)
杜尔	汤平山 (212)
杜克洛	陈 沂 (219)
杜布切克	朱彩霞 (229)
库西宁	徐运朴 (238)
沃斯特	郑家馨 (246)
李承晚	李 钦 (254)
阿齐克韦	张晓华 (260)
麦克阿瑟	华庆昭 (269)
苏赫巴托尔	卢纪雨 (277)
罗歇	唐伯新 (284)
罗曼·罗兰	罗大冈 (291)
拉狄克	力 之 (299)
帕德莫尔	宁 骚 (307)
图哈切夫斯基	敬思 元吟 (316)
南尼	夏方林 (323)

柯西金	徐小雄 (332)
柯都维亚	姚新美 徐世澄 (340)
勃列日涅夫	赵连宏 (350)
高兰	黄雪辉 (357)
夏基	杨 平 (363)
桑戈尔	黄英 羽阳 (372)
爱伦堡	钱善行 (380)
海明威	董衡巽 (387)
莫洛托夫	汤慧兰 (392)
诺沃提尼	朱彩霞 (400)
陶里亚蒂	武克全 (408)
哥穆尔卡	刘邦义 (418)
隆哥	夏方林 (425)
谢胡	夏成文 (432)
崔庸健	沈志远 (438)
野坂参三	田彬海 (444)
曼德列斯	范经家 (451)
普列斯特斯	王春良 (458)
赫鲁晓夫	许俊基 (469)
鲁巴依	时延春 (477)
潘周桢	徐绍丽 李克明 (484)
穆罕默德五世	黄丽英 (490)



马 林

殷 叙 彝

马林(Maring, 1883—1942)，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和荷兰共产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他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

1883年5月13日，马林生于荷兰鹿特丹市一个小职员家庭，家境贫寒，靠别人资助读完中学，毕业后考入荷兰国营铁路当低级职员。他在中学读书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书刊，约在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07—1910年在茨沃勒任党组织主席和党报编辑。这时，他较多地接近党内马克思主义左派，即“论坛派”。1909年党在德文特召开紧急代表大会之后，“论坛派”被开除出党，成立了独立的左派政党，即荷兰社会民主党。马林并没有参加该党，仍留在社会民主工党内，持中派立场。

马林在这一时期主要从事工会活动，1906年任尼德兰铁路和电车职工联合会总执委会委员，1911年被选为主席。随着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斗争的发展，马林逐渐与铁路工会领导中的温和派发生冲突。在1911年6月遍及英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的国际性海员罢工中，他和荷兰社会民主党一同支持带有工团主义倾向的全国工会书记处的激进立场，因而与受荷兰社会民主工党领导

的尼德兰工会联合会产生矛盾，在这个工会联合会中陷于孤立。马林不得不辞去铁路和电车职工联合会主席的职务，退出社会民主工党。他很快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他在党内企图调和两党之间的矛盾，受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怀恩科普等人的反对。1912年，马林宣布脱离该党，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工党。

1913年2月，马林来到荷兰的殖民地爪哇（今印度尼西亚一部分）。5月他出任三宝垄商会秘书，同时参加当地的荷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活动，继续从事工会工作。三宝垄是铁路枢纽、铁路和电车职工联合会总部所在地。马林不久成为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1916年，这个联合会成为印尼（当时称荷属东印度）第一个现代无产阶级组织，是印尼共产党建党的基础。

1914年5月，马林参加创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马林主张该联盟应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同当地的民族主义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即双方的成员都可以保留原来的身份而加入对方的组织。这样可以使社会民主联盟能在组织比较松散的伊斯兰教联盟内进行革命宣传，通过它联系广大群众。1917年2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马林表示热烈支持。他在报刊上公开号召爪哇人民以此为榜样进行革命。不久，马林被荷兰殖民当局提出公诉。他在审讯中连续三次发言为自己辩护，抨击殖民制度，终获无罪释放。此后，马林开始在荷兰舰队的水兵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1918年11月，在他的支持下，苏腊巴亚（泗水）水兵和士兵委员会成立。政府立即进行干预。12月5日，荷兰总督下令驱逐马林出境。同月20日，马林离开印尼。

马林回到荷兰加入了荷兰共产党，任执委会委员，做工会工作。他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仍很关心。1920年7—8月，他作为荷兰共产党的代表，同时也代表三宝垄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殖民

地问题委员会秘书。他曾在7月28日第五次全体会议和8月6日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愤怒地控诉荷兰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东方的殖民罪行。他介绍了自己在印尼通过伊斯兰教联盟开展革命运动的经验。他认为，“共产党人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合作是必需的。假如我们拒绝民族解放运动，那就是一个空谈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积极支持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建议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增加东方各国代表的人数，并主张在远东设立一个宣传局。在这次大会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1920年9月，马林出席了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以后，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即远东局）成员，派往中国工作。

1921年6月3日，马林到达上海，任务是考察中国等东方各国革命情况，并设法同各国革命者建立联系。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也来到上海。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时，马林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开始接触，他建议国民党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当时正在桂林筹备北伐，他邀请马林前去访问。12月10日，马林在中共党员张太雷陪同下，经武汉和湖南抵桂林，同孙中山多次长谈，介绍苏俄情况，并对国民党的军官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马林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向他讲述了发动群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

1922年1月，省港大罢工爆发。这次罢工以及国民党领导下的广州政府对罢工的支持，给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2年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经荷兰回到莫斯科。7月11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马林详细汇报了他在中国的活动，分析了国民党的阶级性质。他认为，国民党的领导成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党在财政上依靠华侨资本家的支持，党的基本群众是军队中的士兵和工人，而后者尤其重要（马林甚至曾把国民党称作“工人党”）。马林提出，国民党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多阶级的政党。对于一个想争取工人群众的组织来说，这是理想的用武之地。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国共合作的决定。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中写道：“中共中央接到本通知后必须立即迁址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与菲力浦（马林化名之一）同志的密切联系下进行。”

1922年8月初，马林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时，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闭幕，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及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马林和中共代表在上海多次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当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发展民主联合战线的指示。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接受了这一意见，但大多数人只赞成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会后只有少数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在马林第二次到中国时，苏维埃俄国派越飞作为外交代表来到中国。马林协助越飞同孙中山进行秘密谈判。1923年1月26日，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为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奠定了基础。

1922年底，马林回到莫斯科。1923年1月10日，他再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执委会肯定了他在在中国的工作。1月12日，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共应在民族革命中支持国民党的正确政策，但不能卷起自己的旗帜，“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马林在执行这一决议时，对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对农民的革命潜力更加缺乏认识，而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作用。1923年“二七惨

案”发生后，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陈独秀在4月25日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错误地提出，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在讨论中，多数代表批评了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但也不同意马林和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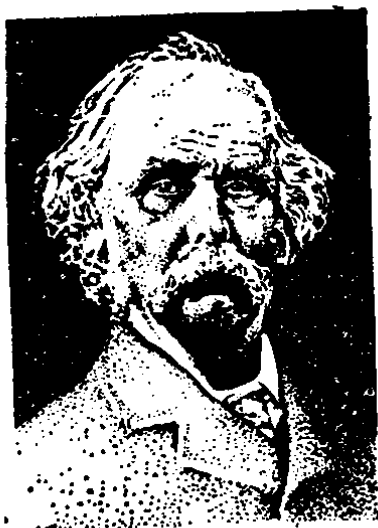
1923年9月，马林担任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职务由维经斯基接替，改任共产国际海参威局委员，继续从事殖民地革命运动工作。马林离开印尼后，几次努力争取撤销对他的驱逐令都未能成功。但他始终同印尼共产党领袖保持着联系。这时，他建议在荷兰为印尼建立一个共产国际支部。这一建议被采纳后，马林于1924年4月回到荷兰，同被印尼驱逐出来的荷兰共产党员、印尼共产党员合作，关注着印尼革命的进展。

马林回荷兰后担任全国工会书记处主席，卷入了荷兰共产党内部尖锐复杂的派别斗争。他始终未能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在1927年脱离荷兰共产党。与此同时，他对苏联共产党（布）党内斗争采取了同情反对派的立场。他主持的《阶级斗争》杂志，从1928年起陆续发表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纲领等反对派文件。从1929年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还刊登了托洛茨基本人的许多文章。1928年4月，马林创立带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1929年发展成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马林任执委会委员。从193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代表这个党参加国会。革命社会党声称，它以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托洛茨基领导下的早期共产国际路线为基础，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现行政策。

1935年3月，革命社会党与荷兰独立社会主义党合并，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马林任书记。从1937年起，该党对苏联国内外政策的批评日趋激烈，一部分人逐渐对苏联国家性质表示怀疑。该党刊物上出现不少攻击苏联是帝国主义的言论。马林最初并不完全赞成这一看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逐渐改变了立场。但他拒绝参加托洛茨基第四国际。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林就积极主张在荷兰成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后，立即查禁荷兰共产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搜捕马林。他开始转入地下活动。同年7月，马林创立“马克思——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战线”。1941年1月至1942年2月出版双周刊《斯巴达克斯》。这个组织宣布，它将继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国际主义传统，主张一切交战国的士兵和工人进行联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认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结束战争，消灭法西斯主义。在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初期，马林曾一度 and 怀恩科普等人组织的左派社会主义团体“火花派”密切合作。

1942年2、3月间，马林和“马克思-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战线”大部分领导人被纳粹逮捕。4月12日，他和其他7人，在阿姆斯特福特被杀害。



马 歇 尔

王 宏 昌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英国经济学家, 近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新古典学派(剑桥学派)①的创始人。

马歇尔于1842年7月26日出生在伦敦郊区。他的父亲威廉·马歇尔是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生性严厉, 对家人专制。马歇尔9岁时, 被送到泰勒学校读书, 主要学希伯来文。马歇尔被他父亲强迫过度用功, 身体瘦弱, 有“蜡烛”的绰号。1861年, 马歇尔因学习成绩优秀, 按规定, 有资格得到奖学金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三年后有希望当研究生。这是他父亲为他计划的, 将来当福音会教士的第一步。马歇尔不愿走这条路, 不愿到牛津埋葬在已死去的古代语言里。马歇尔最喜欢的是数学, 经常把几何教科书藏在衣袋里, 边走路边思考如何解题。幸好有一位好心的叔父, 愿意借给他一些钱, 使他能进剑桥大学学习数学。1865年他参加数学考试, 评为第二名, 因此立即被选拔为研究生。他提出自己要学分子物理学。这时, 他曾短期去克利夫顿学院任数学

① 新古典学派主要人物马歇尔、皮古等长期在剑桥大学执教, 故新古典学派亦称剑桥学派。